

邓小平

小平

百年周年纪念

——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百周年纪念

——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

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百年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7

ISBN 7 - 5073 - 1924 - 5

I. 邓… II. 全… III. ①邓小平 (1904 ~ 1997)

- 人物研究 - 学术会议 - 文集 ②邓小平理论 - 学术会议

- 文集 IV. ①A765 - 53 ②A84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1299 号

邓小平百年周年纪念

——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上中下)

编 者/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责任编辑/王春明 李月兰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680 × 960mm 16 开 135 印张 2068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套

ISBN 7 - 5073 - 1924 - 5

定价：190.00 元 (上中下)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	李德洙 (1407)
邓小平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宗教观分析	拉毛措 马文慧 (1420)
论邓小平侨务思想	卢 荻 (1434)
邓小平中华民族民族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秦 生 (1447)
邓小平民族理论与新疆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	杨发仁 齐清顺 (1461)
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与西部民族地区开发	曾德盛 (1472)
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学习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一点体会	李慎明 (1486)
邓小平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贡献	谷安林 (1503)
邓小平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哲学思考	徐崇温 (1510)
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践把握和理论创新	王展飞 刘育英 (1521)
邓小平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认识及贡献	柳建辉 (1533)
传承和创新：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	
跨世纪探索	奚洁人 周敬青 (1550)
邓小平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贡献	赵子平 (1562)
论西部欠发达地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	
重要性	陈祥骥 赵崇义 (1577)
试论邓小平党内监督思想及其启示	孙 杰 (1589)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简论	邵景均 (1597)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努力把伟人家乡	
建设得更加美好	张学忠 (1610)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加快广东现代化

建设步伐 黄华华 (1613)

论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标准

——学习邓小平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 郑 言 (1623)

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家乡的实践

——实施“六重”举措,推进广安跨越式发展 谭 力 (1632)

略论邓小平哲学思想 余品华 (1639)

“任务特别重大”的战线

——深入研究邓小平的社会科学思想 张成德 李茂盛 (1653)

新时期我国文艺的光辉指针

——学习邓小平文艺理论 张 炯 (1665)

邓小平人权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拓创新 孙 力 (1677)

论邓小平的信息化思想 梁相斌 张武春 姜锦铭 (1689)

论邓小平新闻思想的历史方位 尹韵公 (1702)

邓小平对毛泽东屯垦思想的重大贡献 李书卷 王翰林 (1712)

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陈欣德 (1724)

邓小平与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 傅伯言 余伯流 (1735)

抗战时期邓小平创建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的

战略思想 田酉如 (1749)

邓小平在涉县时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创新 田苏苏 (1769)

邓小平与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 袁德金 (1780)

论邓小平的政治委员生涯 蔡继承 王绍军 岳睿敏 (1799)

从西南的反封建斗争看邓小平的领导艺术 艾新全 (1809)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经济思想 谢荣忠 (1822)

1952—1956年邓小平的工作、思想轨迹 庞 松 (1835)

邓小平 1961年北京顺义调查 谢荫明 郭晓燕 (1847)

邓小平与三线建设 韩洪洪 (1860)

邓小平与 1975 年整顿论略 程中原 (1872)

1975 年整顿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思考 张 化 (1888)

邓小平与新时期改革事业的启动

——以对外交往的转型为线索 黄一兵 (1898)

拨正航船方向 激发改革潮头

——邓小平与安徽农村改革的兴起 杨瑞毛 (1911)

学习邓小平视察讲话精神 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 (1928)

邓小平北方谈话与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 陈文清 (1934)

邓小平天津谈话及其重要意义 李大勇 (1945)

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述论 鲁振祥 (1954)

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徐永军 (1969)

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 陈东林 (1989)

新时期我军建设总目标的伟大实践发端

——邓小平领导和指挥华北军事演习的历史

回顾与思考 朱 启 符廷贵 (2001)

邓小平南方谈话：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

经验的科学总结 丁晋清 (2012)

邓小平政治军事任职的历史考察 王乃德 武威方 (2022)

邓小平与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编辑部 (2046)

学习邓小平的创新精神 许全兴 (2055)

论邓小平的“务实”与“务虚” 谢 越 (2065)

论邓小平战略思维的特色和品格 姚有志 (2075)

“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

——从主政大西南看邓小平的执政风格 王 进 (2087)

论邓小平西藏工作的领导策略 王小彬 (2103)

一大盛事 一次盛会

——在全国邓小平生平思想和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冷 溶 (2121)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

李德洙

民族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党和国家整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都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指导了民族工作的新实践，开创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邓小平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了邓小平民族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宝库，为开创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强调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第一，民族问题的存在是长期的。民族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很长的历史，民族问题在中国的存在也有一个很长的历史。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实行的是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政策，各民族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隔阂和猜疑很深。“历史上的反动

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①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消除了民族不平等存在的社会根源。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忽视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低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② 这既体现了邓小平对民族问题十分慎重而又高度重视的态度,也体现了他对民族问题长期性的科学把握和判断。

第二,要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居住地域广阔,且大多处于边疆。做好民族工作,解决好民族问题,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事关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局。邓小平鲜明地指出:“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③ 因此,“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④ 针对“文化大革命”当中忽视民族问题,取消民族工作的错误做法,邓小平明确强调:“民族工作确有很多问题要提起注意。”^⑤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党和国家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各级民族工作机构,把民族工作摆在了很高的位置。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专门研究讨论了西藏、云南、新疆和内蒙古工作,并向全党转发了这四个讨论会的纪要,^⑥ 确定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第三,民族工作要实事求是。我们党在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过程中,既形成了正确的民族理论政策,又形成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那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又坚持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出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⑤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法规选编》,中国民航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2、24、25页。

发；既鼓励汉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帮助和支持，又尊重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不搞“一刀切”。概括起来，就是民族工作要实事求是。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想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给党的民族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①，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②。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党中央重申了民族政策，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党的民族工作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二、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内涵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各民族之间不可能形成平等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各民族实现了一律平等，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根本上废除了存在民族歧视、压迫、剥削的根源。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邓小平以科学的态度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深刻揭示和回答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内涵。

第一，彻底否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1963年，毛泽东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这个说法是针对在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条件下，美国黑人反对资产阶级统治，争取民族平等权利斗争而言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批判统战、民族工作方面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过程中，“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开始出现和流行。“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一说法成为在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中推行极左路线的基本理论依据，从而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个错误的说法仍然有不小的影响，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② 《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妨碍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根据邓小平有关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① 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②，从根本上否定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说法。社论指出，这个说法无视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基本消灭的基本事实，无视我国各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事实，混淆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界限，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界限，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的基本原理，因而是错误的。彻底否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对于我们搞清楚民族问题实质的理论是非，科学判断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内涵，实行正确的理论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邓小平鲜明地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③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我们党在彻底否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错误说法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④ 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强调：“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就深刻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质是什么的问题。1992年1月，江泽民同志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⑤ 这个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法规选编》，中国民航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② 《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法律法规选编》，中国民航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⑤ 《民族工作文献选编（1990—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

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民族问题的科学内涵，标志着我们党对民族问题实质的认识更加完善和科学了。

第三，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内涵是平等、团结、互助。邓小平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内涵概括为“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在他主持下修订并于1982年颁布实施的《宪法》，对此进一步作出了科学、完整的概括，指出：“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原则的坚持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成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民族关系的主旋律。邓小平高度评价“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1981年，中共中央在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江泽民同志丰富和发展了“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①这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民族之间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关系的生动概括，对促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关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邓小平在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时，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精神，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尝试，并获得了成功。特别是在四川藏族地区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极大地调动了藏族人民拥护共产党的热情，为和平解放西藏，建立西藏自治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第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采取民族区域自治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的结果。邓小平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

^① 《民族工作文献选编（1990—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5页。

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① 在1986年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他还强调：“我们中国是团结的，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好的，毛主席是英明的，没有搞什么民族自治共和国。有的国家搞民族自治共和国，矛盾很深，不好解决。”把民族区域自治上升到社会制度的优势，是邓小平科学总结我们党和世界上一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党的十五大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道确立为国家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表明我们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第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把经济搞好。邓小平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他还说，经济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② 1984年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把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坚定立场。

第三，切实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遭到了破坏，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得不到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③ 强调“真正”二字，就是要切实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撤销的民族自治地方得到了恢复，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新建了一批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第四，用法律保证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邓小平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④ 这是实施依法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④ 《新疆各族人民永远怀念邓小平》，《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

治国方略的长远之策。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仅次于国家宪法的一部基本法律,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四、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作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坚定地予以贯彻实施。1981年,中共中央批准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明确指出:“坚定不移地关心、帮助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全面发展”。198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切实把经济工作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①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②

第一,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方能不能发展起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抓住了发展问题,就抓住了民族问题的核心。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③发展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经济发展是关键。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④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关键要看怎样对少数民族有利,怎样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尽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方能不能发展起来”。^⑤

第二,“两个大局”是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战略构想。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大问

① 《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③ 《民族工作文献选编(1990—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④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题。邓小平在设计我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中，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① 邓小平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发展迅速，而西部地区相对发展缓慢，拉大了东西部差距。由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而东部主要是汉族，东西部差距既包含区域发展差距，也包含民族发展差距。因此，缩小东西发展差距，不仅是地区间协调发展的问题，也是民族间协调发展的问题。这也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③ 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指明了从根本上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1999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实践。

第三，民族地区也要改革开放。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也是消灭少数民族贫困和落后，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真正兴旺发达的民族，是开放的民族。民族地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很多，改革的任务更为必要，更为迫切。邓小平指出：“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④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改革的中心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破除一切阻碍和不利于生产力前进的旧的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使各民族在联系交流中增强生机活力，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第四,大力发展民族教育文化事业。邓小平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他曾经针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匮乏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① 1951年西南民族学院成立时,邓小平为该校题词并致电祝贺,强调要搞好民族学院的工作,多出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服务。1952年该院第二期开学时,邓小平亲自参加开学典礼并题词勉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销的民族院校在邓小平的关怀下,都得到了恢复。1980年,他指出,要根据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努力发展文化,因此“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都要加强”。^② 按照邓小平关于办好民族学院的指示精神,各民族学院都从各自的实际出发,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坚持特色办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五、关于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邓小平强调:“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③ 他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培养本民族的干部。”^④ 他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期间,培养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干部,有力地支援了西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我们党把大力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作为新时期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的任务。1981年8月,邓小平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视察工作期间深刻地指出:“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新疆的工作能不能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③ 邓小平1952年7月为西南民族学院的题词。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要“注意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① 1993年6月，有关部门召开了专门研究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座谈会，会后形成《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意见》，阐述了现阶段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强调加强少数民族专业技术干部队伍建设，使少数民族干部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邓小平在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同时，还主张向民族地区选派一部分能够真正帮助少数民族的汉族干部。他强调指出：“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必须保证这一点。”^②

六、关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事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在中国，各民族都有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神圣义务。

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坚定立场。邓小平一次在谈到西藏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③ 1990年，他再次强调：“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④ 邓小平强调“真正”的民族平等含义在于，不仅要帮助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利，而且还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得到改善和提高，这样才能为维护民族团结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邓小平强调，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搞好民族团结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⑤ 搞好民族团结，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一是要消除民族隔阂。二是抛弃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是反

① 《新疆各族人民永远怀念邓小平》，《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对大汉族主义”^①。“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②三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③四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

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1981年8月，邓小平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视察工作期间曾经指出：“不许搞分裂，谁搞就处理谁。”^④民族分裂活动是破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最大危险，是影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流亡国外的分裂主义势力与国内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相勾结，进行所谓“西藏独立”、“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分裂活动，是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民族分裂主义行径，他们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七、关于做好民族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

民族问题既具有其他社会问题的共同特点，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民族问题的特点和规律，形成了做好民族工作的方法和原则。

第一，调查研究，摸准情况的原则。民族问题是长期的、复杂的，做好民族工作的前提就是要多作调查研究，摸准情况。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时说：“你们在少数民族方面研究、了解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特别是你们下去以后，亲身接触具体情况，会发现许多问题。我们很希望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多提意见，哪怕是一个片面的意见，也比没有意见好。”^⑤邓小平以谦虚谨慎的态度阐明了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对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对于调查研究，邓小平身体力行。在十八军入藏前，他发出“关于进藏部队成立研究室”的指示，吸收一些了解西藏情况的专家学者参加。研究室进入西藏后，对西藏政治、军

①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④ 《新疆各族人民永远怀念邓小平》，《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

⑤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